

中國語言文學論文集

(二)

河南大學學報叢書

一九八五年

中国语言文学论文集

(二)

科研处编

河南大学学报增刊

一九八五年六月

中国语言文学论文集（二）

编辑出版 河南大学学报编辑部

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印刷 中牟县印刷厂

国内总发行 开封市邮电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中国国际书店北京2820信箱）

期刊登记证〔豫〕第十三号 国内、外代号：36—26、BM524

中国语言文学论文集

目 录

试论中国寓言的产生及其早期的发展·····	白本松 (1)
《尉繚子》初探·····	何法周 (14)
论孔孟之道·····	何法周 (25)
从《离骚》看屈原的思想和艺术·····	李嘉言 (40)
《离骚》的思想倾向和创作方法新探·····	李 博 (52)
司马迁尊奉黄老论·····	张家顺 (62)
论孔融·····	宋景昌 (72)
佛教对于六朝文学的影响·····	李嘉言 (86)
试论陶渊明的政治倾向·····	高 文 何法周 (100)
试论陶渊明的创作方法·····	王绍龄 (121)
陶渊明与门第观念·····	王立群 (141)
读杜札记·····	万 曼 (149)
怎样评价杜甫及其诗歌·····	王宽行 (159)
气质慷慨 魄力雄毅 ——唐代边塞诗人高适·····	高 文 (179)

中唐边塞诗简论·····	华 锋 (186)
重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与艺术特点·····	华钟彦 (195)
《长江集新校》前言·····	李嘉言 (206)
初唐诗重出甄辨·····	佟培基 (220)
略叙《唐写本唐人选唐诗》署名无常例·····	孙 方 (242)
贺铸年谱·····	王梦隐 (258)
辛词《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作年考辨·····	陈江风 (278)
陆游的儿女·····	郭 光 (287)
元人杂剧反映元代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	李春祥 (297)
“古怪新奇” “德然辉光”	
——评钟嗣成《录鬼薄》·····	李春祥 (320)
从古典的清官戏说起·····	华钟彦 (330)
浅谈《红楼梦》的艺术结构·····	邢治平 (344)
《石头记》成书过程质疑·····	康保成 (357)

试论中国寓言的产生及其早期的发展

白本松

我们祖国是寓言极为丰富的国家。在我国浩瀚琳琅的古代文学宝库中，寓言犹如一串串闪闪发光、永不朽烂的明珠，引人注目。寓言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上堪称源远流长、根深叶茂了。但是，我们对中国古代寓言的整理尤其是研究，至今还处在开始阶段，关于寓言的许多重要理论问题，尚未涉及或及之不深，有待于今后学者们的共同研讨。笔者不憚浅陋，仅就中国古代寓言的产生及其早期的发展问题，试抒管见，以期引起讨论。

中国寓言不产生于春秋晚期

中国古代寓言产生在什么时代？它的早期发展状况如何？在早期发展阶段上它有哪些特点？这些无疑都是中国古代寓言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因为后来各代的寓言文学都是在早期寓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都是早期寓言的子孙。

多年来，人们在谈到中国古代寓言时，总是从战国时代讲起；在编选中国古代寓言集时，也总是从战国诸子散文选起。这无形中就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好象中国古代寓言是从战国时代才产生的。这当然是一种错觉。早在二十年前，高亨先生就曾经指出：在《周易卦爻辞》中，有三首短歌，“它们虽然简短，然而都有人物和故事情节，都有主题思想，都能说明一种道理，把它们看做小小的寓言，不算太过。”他还指出：《诗经》中的《鸛鸣》是一首寓言诗。这是十分有见地、有价值的意见。但他同时又写道：“用寓言来说理”“实开始于战国中期。”^①这就使他那很有价值的意见失去了不

少光辉，也没有能够引起学术界普遍的应有的重视。近来，陈蒲清、曹日升二同志却提出了一种比较明确的说法：“中国古代寓言大概在公元前六世纪便产生了，这和传说中的古希腊寓言家伊索生活的时代差不多。我们目前见到的最早资料可能要算《左传》昭公二十年（公元前五二〇年）宾孟向周景王说的‘雄鸡断尾’的故事。”^②这个提法显然是不确切的，别的不论，单就《左传》来讲，它也不符合实际，比如被兆文等同志选入他们编的《中国历代寓言选》中的《牵牛蹊田》的故事，就记载于鲁宣公十一年（公元前五九八年），比昭公二十二年早了半个多世纪；而庄公十四年（公元前六八〇年）记载的“内蛇与外蛇相斗”的故事，也应该看作是郑国人民群众创作的讽刺郑国公室内部分争权夺利斗争的寓言，这又比宣公十一年早了半个多世纪，已经上推到公元前七世纪的前期。还有，严北溟同志编选的《中国古代哲学寓言故事选》中，收了五则《周易卦爻辞》里的寓言故事，这些作品大概产生于殷周之际，约当于公元前十一世纪了。因此，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中国古代寓言到了公元前六世纪、即春秋晚期才产生。

关于中国古代寓言产生时代的推断

那么，中国古代寓言究竟产生在什么时代呢？我认为中国寓言至少在殷商中后期即公元前十三世纪左右就产生了。其理由如次：

首先，在《尚书·盘庚中》里已经出现了寓言的例子：

尔惟自鞠（穷）自苦，若乘舟，汝弗济，臯厥载（指舟）。尔忱（沉）不属（独），惟胥（皆）以沉。不其或稽（考察），自怒曷瘳（愈，益）。

这是殷帝盘庚在说服臣民迁都时讲话中的一段。他把不愿迁都的臣民比作乘船渡河，已经上了船却迟迟不肯渡过河去，在犹疑中坐待船的朽烂的覆人，不独自己将沉没，大家都要跟着淹死。在船将要沉没时，又不去考察船沉的原因，只会独自发怒，这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我们知道，寓言脱胎于比喻，这个故事用了第二人称，还

有直接比喻的性质，即还带有寓言母体的某些特性。如果我们把第二人称代词“女”、“尔”略去不读，或换作第三人称，这个故事不是同后世的寓言一样，是一个形象生动、具有情节和讽刺意味的寓言吗？应当指出的是：盘庚是位帝王，他当然不可能是寓言文学的创造者。这个故事也可能是他自编的，更可能是他听来的，自己在引用时加以改造。但是，不管哪一种情况，都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在他之前社会上已经存在着寓言的表现方式，而且为人们所广泛采用，甚至达到了连他这个高高在上、身居深宫的帝王也受了它的影响的地步，所以寓言的产生一定在盘庚之前。盘庚是殷商的第十代王，殷商从汤到纣共传十七代（三十五王），盘庚之后还有七代（十一王）。殷商的历史大概有五百多年，从公元前十六世纪到公元前十一世纪。这样算来，盘庚大概生活在公元前十三世纪末到十二世纪初。因而我们说寓言的产生至少在公元前十三世纪左右，要略早于盘庚。

可以帮助我们作出上述推断的还有一条资料：

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尽）。”

（《尚书·牧誓》）

这是周武王兴兵伐纣时发布的动员令中的一段话。在这里，他用“母鸡打鸣”的古代故事为喻，对殷纣王宠幸妲姬因而造成朝政昏乱、殷将灭亡的局面进行揭露与讽刺，应该说是一则寓言。周武王称“母鸡打鸣”的故事是“古人”所谈，虽然“古”到什么时代不可确指，但总是距他生活的时代公元前十一世纪较远，我们把它上推到公元前十三世纪大概不能算过分吧？还有，“古人”的身分这里虽然没有点明，但我们可以断定他是劳动人民，因为靠鸡鸣报时是人民群众的习惯。而这个故事用的不是第二人称，不是对某件具体事情的直接比喻，带有普遍意义；由此可知，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寓言故事，这时已经从它的母体比喻中独立出来了，不再是一种修辞的手段，而是一种文学样式了。虽然这种样式还比较粗糙，但却是后来寓言发展的嚆矢。

其次，从文学发展的本身规律来看，寓言的产生在盘庚之前也应该说是具备了条件的。前面已经提到，寓言是比喻发展来的，因而大凡寓言都有比喻意义，换句话说寓言就是用讲故事来打比方。但比喻并非寓言，在一般的简单的比喻和寓言之间，还存在着一个过渡形式，就是复杂的比喻形式。我们知道，比喻在盘庚之前很早就已经存在，如《尚书·皋陶谟》：“帝（舜）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舜）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这里用人的头和四肢来比臣君的地位、关系，这是原始社会末期比喻的例子。又如《尚书·汤誓》：“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这里人民借诅咒酷烈的太阳来诅咒夏桀，这是夏朝末年比喻的例子，隐去了被比的对象（桀），其中已经孕育着寓言的种子。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经验越来越丰富，思想越来越深刻，感情越来越复杂，便逐渐地不满足这种简单的比喻方式了，开始运用比较复杂的比喻来讲道理。到了殷盘庚时代，这种比喻方式已经普遍使用，在《盘庚上》中，就有不少这种比较复杂的比喻的例子。如：“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衣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惰农自安，不昏（斃，努力）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恐沈于众，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迓，其犹可扑灭？”盘庚的侄儿、殷朝一代明主武丁也善于运用这种比喻，如他对傅说讲：“若金，用女作砺；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汝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视地，厥足用伤。”③帝王讲话尚且如此比喻成串，有的比喻还有简单的情节，带有寓言色彩；可以想见，当时社会人们在语言交流中，比喻的运用已经到了何等娴熟、普遍的程度。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中，作为由复杂的比喻形态发展而成的喻言文学的存在，就是很自然的了。可惜史官只重记实，那些虚构的寓言故事被认为是荒诞不经的，因而在文献中没有保存下来。但寓言的被运用，在盘庚时代应该说是没有疑议的。

再次，从寓言产生的社会基础来看，奴隶社会已经完全具备了

它生长的土壤。从原始公社制社会进到奴隶社会，这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极其深刻的、根本的变化，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而也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方式和感情。私有制的确立，阶级的形成，不仅在对抗阶级之间播下了仇恨和憎恶的种子，而且还使得同一个阶级成员的内部也时常产生怀疑、欺诈、虚伪与争夺（当然还有与此相反的一面）。社会生活经验、特别是处于被压迫地位的生活经验告诉人们，为了避免报复，不得不用曲折的、旁敲侧击的方法来表现自己的不满和憎恶；即使对自己朋友的缺点的批评，也是用含蓄的方式更好。人们终于找到了这种方式，这就是把原来直接的、简单明了的比喻，变成用讲故事来打比方，在故事中寄托一种不局限于某一件事情上的寓意，使人听起来好象是在讲述与己全不相干的什么事，实际上则是含意更深刻；这就是后来人们称之为“寓言”的东西。寓言是讽刺和劝诫的文学，讽刺多用于自己仇恨和憎恶的对象，劝戒多用于自己同情和爱护的对象。因此我们说，寓言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为斗争服务的，这种斗争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特别是阶级斗争，而不是人与自然的斗争（神话是反映这个斗争的）。因而它不可能在原始公社时代产生；但也不必等到封建社会，尤其是在文明较早的民族里是如此。在奴隶社会里，斗争需要它，文学的发展又为它的出世准备了条件（这除了比喻的发展之外，神话也为它提供了拟人与夸张的创作经验），于是它在母体（比喻）里经过相当一段的发育之后，便应运而生了。古印度寓言产生于奴隶社会，古希腊寓言产生于奴隶社会，中国的古代寓言也产生在奴隶社会，这也许是个规律吧？（当然不可以以此来例其他文学样式）

中国古代寓言的早期发展过程

如果把殷盘庚前后的一段时间看作寓言的产生（即它从母体比喻脱胎而出）时期，而把春秋末年（如《晏子春秋》中的资料等）到战国末年看作寓言发展的高潮（包括酝酿与形成）时期是比较适

当的话，那么，我们这里说的寓言的早期发展过程，是指从殷末周初到春秋中期这一段历史时间内寓言的发展状况而言。在这六百年的时间里，又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殷末周初，这是寓言的孳乳时间；（二）西周成康之后到春秋中期，这是寓言的继续发展时期。下面就来试着叙述一下这两个时期的寓言发展的大致情况。

需要先为说明一点的是：在本节中所引的寓言资料，全部出于《尚书》、《周易卦爻辞》和《诗经》。关于这三部古笈的成书年代，学术界至今意见纷纭，未可遽定。这几部书大概都有一个积累资料、编辑的过程，多数人认为《周易卦爻辞》编辑、成书的年代应在殷末周初；《诗经》的成书年代不晚于春秋中期，其中包括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前后约五百多年的作品；至于《尚书》，各篇的写定时间前后相差很远，但它们都保存了所叙事件的一些原始历史资料，这一点是可以相信的。

（一）殷末周初的寓言。中国古代寓言是个幸运儿，在它出世不久，便交上了好运；到了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国社会发生一次大动荡、大变化，殷王朝由衰败到覆灭，周王朝由建立到巩固。这是一个社会矛盾尖锐、政治斗争激烈、新旧交替的时代，最适合寓言文学的生长繁殖。所以寓言在这个时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这可以从《尚书》、《诗经》，特别是《周易卦爻辞》中得到证明。

在《周易卦爻辞》中保存了这个时期寓言的丰富资料，据笔者约略统计，不下三十来首。比如《羝羊触藩》、《即鹿无虞》、《驾车顶牛》、《困石据蒺》、《窒井碎瓶》（后三首即高亨先生称之为寓言短歌的作品）等，已被选入严北溟同志编写的《中国古代哲学寓言故事选》一书中，可以参看。这里再举一些例子，以证所言非诬：

眇能（而）视，跛能（而）履，履虎尾，啞人。（《履·六三》）

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盲目且跛足的人，还要自己看物走路，结果踏到虎的尾巴上，被猛虎吃掉。这是对那种好逞其能、强干力所不及的

事，结果反害了自己的蠢人的讽刺。

系小子，失大夫。（《随·六二》）

这个故事讲：有人在战争中得到俘虏，以绳拴之而防其逃，但他却先拴小孩，后拴大人，结果在他拴小孩时，大人已经逃掉。这是讽刺顾小失大者。

贲其趾（足着饰花纹鞋），舍车而徒。（《贲·初九》）

这个故事讲：有人穿着漂亮的花鞋乘车，为了向别人炫耀其鞋之美，竟舍车而步行。这是讽刺处事本末倒置者。此外，尚有“丧马，勿逐，自复。”（《睽·初九》）“负且乘，致寇至。”（《解·六三》）“井谷（井口）射鲋（小鱼名），瓮（汲水瓶）敝漏。”（《井·九二》）“丰其蔀（棚），日中见斗（当作主，古烛字），往得疑（疵）疾。”（《丰·六二》）“丰其沛（旆，布幔），日中见沫（魅），折其右肱。”（《丰·九三》）“‘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旅·上九》）等等。

《周易卦爻辞》中这些含有深刻哲理的小巧玲珑的寓言，从内容上可以明显地看出，它们多数是在民间故事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这也许就是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古代朴素的辩证思想的根源所在。从形式上看，这些寓言不再具有直接比喻的特点，而是采用了后来寓言普遍使用的由作者客观叙事的方式。也就是说，这时寓言已经同作为修辞手段的比喻分了家，成为完全独立的文学样式。那种寓言和比喻不分家的情况，只在少数统治阶级创作的、比较粗糙的作品里还保留着，这正说明了统治阶级的保守性，比如：

若考（父）作室，既底（定）法，厥子弗肯堂，矧肯构？厥

父菑，厥子弗肯播，矧肯获！厥考翼（思虑深远），其肯曰：

“予有后，弗弃基？”肆（故）予曷敢不越卬（我）敕（平定）

宁王（文王）大命（《尚书·大诰》）

这是周公东征管、蔡时发布的讲话中的一段。他以盖房种田为喻，说父亲已经制定了盖房的原则，耕好了田，奠定了事业的基础，儿子却不肯继续努力去完成它，这样，深思远虑的父亲怎么肯说：“我

有后代，他们不会抛弃我的基业”呢？所以我怎么敢不亲去讨平叛乱，完成文王从上帝那里接受的大命呢？这段话采用了以故事来说理的方式，可以看作是初级的寓言，但前面用了比喻词“若”，后面出现了被比的对象“予”，又带有明显的直接比喻的性质。当然，在统治阶级作品中也不全是如此，比如：

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艰难，乃逸，乃谚（谚，粗暴）既诞（放肆）。否则（同丕则，乃至干）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尚书·无逸》）

据《史记·鲁世家》记载：《无逸》为周公所作，是告诫成王不可贪图安逸享受的。引文是其中的一段，讲的是有个农人，他的父母辛勤劳作，他却不知父母的艰难，坐享父母的成果，后来就变得粗暴放肆，乃至轻侮他的父母，说他们是些什么也不懂（指不知享受）的蠢人。这是一首比较成熟的寓言。另外，《诗经》中的《鸛鸣》是一首更加完美的寓言诗，据《尚书·金縢》说亦为周公所作，诗的内容与当时史实基本相符。武王死后，周公摄政，管叔、蔡叔等放出流言，说周公将不利于成王，他们并同殷纣之子武庚勾结，发动叛乱。周公为了保卫王室政权，率师东征。成王因受流言所惑，不察周公之志，反存疑心。于是，周公在东征胜利之后，即作此诗以贻成王。全诗自始至终以一个鸟的口吻来写，表现它在被恶鸟鸛抓走一二个小鸟之后，为了防御更大的天灾人祸，不避艰险劳苦修巢筑室的过程，以及其痛切哀怨的感情。诗以“鸛鸣”比武庚，以被鸛抓去之“子”比管、蔡，以“鸛子”比成王，以“室家”比周朝，以讲话的大鸟“予”比周公自己，是一首完全以鸟为角色的寓言诗。这类作品数量虽少，但在寓言发展史上却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开创了后世作家个人创作寓言作品的先河。

（二）成康之后到春秋中期的寓言。这个时期的寓言资料主要保存在《诗经》中，其他记述这个时期历史的典籍如《国语》、《左传》等书中反而不多，这是因为它们同《尚书》一样，也是根据只重记实的史官记录的资料写成的，那些虚构的寓言故事大概就

很难被录用了。在《诗经》中，那些为数众多的具有简单情节、带有某种寓言性质的比喻除外，整篇就是一首寓言诗、或者篇中包含有比较完整的寓言的作品，大约有十多篇。其中，有些是属于西周中后期的作品，如：

《桧风·隰有苕楚》：“隰有苕楚，猗猗其枝。天之沃沃，乐子之无知。”这是一首对黑暗政治不满的诗。全诗共三章，二、三章最后句为“乐子之无家”、“乐子之无室”。诗以苕楚（羊桃树）的自由生活来反衬人民生活的负担沉重，终年劳苦，仍不足以养活家室。

《小雅·伐木》第一章：伐木丁丁，鸟鸣嚶嚶。出于幽谷，迁于乔木。嚶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神之听之，终和且平。”《伐木》是贵族宴享朋友故旧的乐歌。这一章说：伐木的丁丁声惊动了山谷中的群鸟，鸟嚶嚶地叫着，从深谷飞到山头高大的树上。鸣叫啊鸣叫啊，为的是找寻飞散了的朋友。看看鸟还知道求友，何况是人，怎能不求朋友呢！人如不遗故旧，就会和平无事。此章可看作寓言，前六句是故事的本体，后六句是点明寓意。与此形式相类似的还有《小雅·正月》第十一章。此外，《小雅·鹤鸣》、《小雅·无羊》第四章也都是寓言。

在《诗经》中，有些寓言作品是属于春秋时期的，比如：

《周南·螽斯》：“螽斯（蝗虫）羽诜诜兮，宜尔（指螽斯）子孙振振兮。”（全诗共三章，二、三章略）这是一首劳动人民讽刺剥削者的诗。诗以蝗虫作比，说它们成群地到处飞翔，吃尽了人民辛勤种植的庄稼，养肥了自己，又不事劳作，难怪他们子孙那么多！

《邶风·新台》第三章：“鱼网之设，鸿（虾蟆）则离（罹）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患丑疾者）。”旧注以《新台》为讽刺卫宣公的诗。卫宣公为其世子伋娶齐姜氏为妻，见姜氏貌美而占为己有。诗是从齐女的角度落笔，说：设下鱼网为了捉鱼，虾蟆却窜进网来；少女本想找个英俊少年作配偶，结果却嫁了个丑老头。此

章喻得非所求。

其他如《卫风·芄兰》借对无知幼童冒充成人的滑稽相的描写，来寄托作者对卫惠公讽刺之意；《魏风·硕鼠》借对老鼠不劳而食、贪得无厌、极端自私本性的刻划，来表现劳动人民对剥削者的憎恶与愤慨；《曹风·蜉蝣》以朝生暮死的短命蜉蝣为喻，揭露了统治者面临危亡而不自知，还一味追求享乐的愚蠢性格，等等，都是饶有趣味的寓言作品，这里不再赘引了。

由上述可知，寓言文学诞生之后，从来没有停止过发展，它在社会斗争生活的土壤中取得了丰富的用之不尽的营养，迅速地成长起来了。特别是在人民群众中，寓言已成了人们喜爱的文学表达样式，活跃在各个角落。到春秋时期，寓言文学已经不是对社会政治斗争还幼稚无知、充满好奇心理的儿童，而是一个生气勃勃、跃跃欲试的青年，他参与了斗争并且开始领略到了斗争的欢乐。寓言文学距离它的成年阶段没有多远了。

历史进入到一日百战、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一些文人学士为了丰富自己的思想，增强自己理论的说服力量，都注重向民间学习，汲取新的养营，学习艺术手法。这时，长期在民间流传的寓言故事同神话传说、民歌谚语一样，也被文人所采用，经过加工改造，写进了他们的著作中，使大量的寓言资料得以保存下来。同时，这些文人学士也自己创作寓言，并且出现两位寓言大师即庄周和韩非，大大促进了寓言文学的发展。这样，在战国中、后期便形成了我国古代寓言发展史上第一个高潮，寓言文学也进入了它的深知人世冷暖、斗争经验丰富、完全成熟的阶段。但是，不要忘记，在这之前寓言在它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资料 and 创作经验，为后来的大发展准备了条件，奠定了基础。没有这些，高潮的出现是不可能的；不了解这些，高潮的出现就是不可理解的。

中国早期寓言的特点及其影响

据说，在世界文学史上有不少国家或民族的寓言文学是在外来

寓言的影响下产生的，是别的国家的种子在移居的土地上开的花朵。中国古代寓言则不是这样，它完全是在华夏的土地上土生土长的。我们知道，外国寓言流传到中国来是很晚的事情，古印度寓言是在南北朝时期随着佛经的大量被翻译而传进来的；而古希腊的《伊索寓言》的第一个汉译本则出现在明朝天启年间（初名《况义》）。这就是说，在中国古代寓言产生时以及它发展的早期，还没有外来影响可接受，更何况那个时候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也许还根本没有寓言文学呢。所以中国古代寓言有它自己的不同于别国寓言的特点。

第一，在故事的角色方面，以人为主的，在中国早期寓言资料中占主要倾向。这个传统为以后历代寓言所继承，形成了中国寓言不同于外国、特别是西方各国寓言的一个主要特点。这只要随便拿一本中国古代寓言的选本与外国寓言集子加以比较，就可以明白。在外国寓言中，比如《伊索寓言》、《拉·封丹寓言》、《克雷洛夫寓言》等，以动植物为主角的占大多数，以人为主角的只是少数。以人为主角和以动植物为主角这两种艺术方法谁个优、谁个劣，难以论定；但是以人为主角至少有这样一个特点：因为它是以直接的方式来描写人的社会生活，所以能给读者更亲切的感觉，更便于了解其中的含意，因而也就容易发挥它的战斗作用与教育作用。

第二，《诗经·荡》（因原文过长，前面未引）是以假托的历史人物为主角的寓言诗（假托周文王指责殷纣王，来指桑骂槐地指责周王）；在《周易卦爻辞》中，还有少数以历史故事为主体的片断，具有寓意，类似寓言，如“丧牛于易”是殷祖王亥的故事，“帝乙归妹”是殷纣之父殷帝乙的故事，“王用亨（享）于西山”是周文王的故事等。这种手法在早期寓言资料中虽然少见，但值得注意，它对后来寓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它是总结“历史经验”的姿态出现的，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感，更能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所以在后世的寓言创作中被广泛使用，以至于形成了中国古代寓言的另一大特点。当然历史故事并非都是寓言，它与以“历史故事”为主体的寓言故事最根本的区别，就是看它有没有虚

构的情节和寓意。比如在战国时期的寓言中，有大量的以“历史故事”为主体的作品，它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所写的故事虽然有历史的影子，但经过寓言作者的加工改造，已经面目全非了，象《韩非子·喻老》中“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是把战国时的名医扁鹊行医的事上拉到春秋时的蔡桓公身上；《五蠹》中“徐偃王行仁义而亡国”的故事，则是将西周时徐偃王的事下推到春秋时楚文王身上；另一类是故事情节纯属虚构，所谓的“历史人物”不过是假借其名而已，象《五蠹》中“楚令尹杀直躬”、“仲尼赏鲁民”的故事，《庄子·盗跖》中“盗跖骂孔丘”、《列御寇》中“曹商使秦”的故事，就是如此。这类作品在外国寓言中是少见的，这也是中国古代寓言与外国寓言不同的特点之一。

第三，在中国早期寓言资料中，还有少数作品是用歌颂的态度来写的，如《鸛鷖》中对不辞劳苦经营室家、抵御强暴的大鸟，《伐木》中对以鸣求友的义鸟，《无羊》中牧人那具有神话色彩的梦，《卷阿》中对象征周王的、神话传说中博得众鸟相从的凤凰等，都是赞颂的。这类作品的寓意一般都是劝喻性的。这对后世寓言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在以后历代的寓言作品中，以正面形象为主角的也有相当数量，包括那些取材于神话的作品。比如：《庄子·逍遥游》中“鲲鹏之变”中的鲲鹏，《外物》中“任公子钓鱼”中的任公子，《列子·汤问》中“愚公移山”中的愚公，《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中“西门豹纳玺”中的西门豹，“曾子杀彘”中的曾子，柳宗元《梓人传》中的梓人，欧阳修《卖油翁》中的卖油翁，等等。我们知道，以失败的教训来表示劝诫的寓言，中国和外国都很多；而这种以正面形象为主角的歌颂性的寓言，在外国寓言中则较为罕见。这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寓言的一个特点。

注 释

①高亨：《周易卦爻辞的文学价值》，载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二日